

漢中
出土商代青銅器

SHANG
BRONZES
FROM
HANZHONG

4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

第四卷

主編 曹璋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 4/曹瑋主編.-成都:巴蜀書社, 2010.8

ISBN 978-7-80752-623-0

I. 漢… II. 曹… III. 青銅器 (考古) -陝西省-商代-圖錄

IV. ①K876.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0) 第 110844 號

策 劃 段志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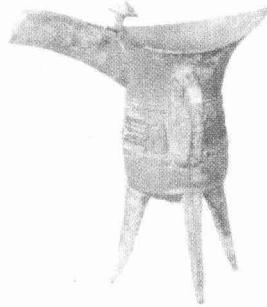
責任編輯 李 蓓 潘偉娜

圖版設計 古 蓉

封面設計 敬人書籍設計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 (第四卷) 主編 曹 瑋

出版發行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成都槐樹街2號 郵政編碼 610031)
電 話	總編室: (028) 86259397 發行科: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網 址	www.bsbook.com
電子信箱	bashubook@163.com
排 版	四川勝翔數碼印務設計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028) 82601551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285mm
印 張	44.75
字 數	1200 千
書 號	ISBN 978-7-80752-623-0
定 價	280.00 圓



SHANG BRONZES FROM HANZHONG

Volume IV

Edited by CAO WEI

**BASHU PUBLISHING HOUSE
SICHUAN PUBLISHING GROUP**

前 言

許倬雲

(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

曹璋、孫岩兩位教授邀集了中外專家，討論漢中地區出土的各種青銅器物，集為一冊。這一集中研討，與集中在考古學上某一遺址或某一文化的研討，頗不一樣。漢中地區出土的商周時代青銅器物已有相當數量，但是至今尚不能找出一個所謂漢中文化的傳統。

本書各篇論文，有的從器物形態觀察，有的從裝飾藝術着眼，有的從青銅工藝討論，有的從器物出土地點下手……却大致有一個相當接近的結論：漢中諸器物群，個別的與地區外面的某一文化傳統有類似之處，但找不到漢中顯而易見的土著形態。這一同觀察，當與漢中地區的地理狀況有密切關係。漢中地區在中國南北氣候分界線秦嶺—淮河帶上，北接陝西黃土高原，南連四川盆地邊沿的大巴山脈，而北是喜馬拉雅造山運動的大折疊，東南則向江漢平原的邊緣開延。這一地形兩側高而逼近，中間河谷落差大，而又沒有河谷的平坦谷地，即使東向出口，也山高谷深，平地不多，須出了川陝大巴山，纔進入江漢平原。

將漢中平原與秦嶺—淮河線的東端淮水流域相比，藉中國古代地理分區的名稱而言：漢中地處梁、雍、益、荆四州的交界處，淮域則是青、徐、冀、豫四州的十字路口。但是東方淮水流域地區大，平原多，水量豐富，四面各處都是考古學上的主要文化區。以新石器時代文化晚期而言，有夏家店、大汶口、石家河、

廟底溝諸文化，而在商周時期，則是“三代”的中原與後世所謂齊、魯、荆、楚、燕諸文化及其前驅。這一地區，人口多，資源豐富，遂接受四隅的文化，也由四隅的刺激而不斷發展了自己的特色。

漢中地區，雖然在新石器時代的早期，已有稻作及更多的黍稷耕作，其資源也有古代極為珍貴的黃金及綠松石，以此與外界貿易交接，終究因為漢水河谷遍處四邊高聳的山地，中間可耕地不多，難以維持多量人口，當然就不能發展大型的複雜社會，構成邦國。因此，以西周時代的情形言，周人集結的伐商聯盟，蜀庸二處，可能來自漢中。然而，周人建立的封建網絡，其中並沒有漢中地區的諸侯。謝西九州，可能在漢中谷地東面的開口處，其中申呂多已移到東方。西周的南土是採取吉金的通道，也會僅從漢中取得金銅。

在後世歷史上，項羽封劉邦為漢王，實是禁錮劉邦於漢中。劉邦的帝業則是在衝出漢中，佔有關中，再藉巴蜀的資源，始得打敗項羽。三國時，蜀漢的防線，漢中的重要，不下於荊襄，却也不能以漢中為基地，北取關中，東北入中原。漢中的地形特點，殆自古如此。

回到古代，荆楚初期，當是立足於漢中地區東面出口處，但其發展，則從取得唐鄧及漢水中游，始得逐漸興起，蔚為南方大國。若是局處漢中，荆難以發展為楚。

本書諸文均為考古專業，各有其可佩之處。我不再予以置喙；祇能嘗試從漢中地區的地理條件討論，以為漢中特殊的情況，足以接收各處文化影響，更可能取得外來器物，却不易發展為本土的文化傳統。

二〇〇八年九月四日

目 錄

前 言	許倬雲 (001)
漢中城固、洋縣出土商代青銅器綜論	朱鳳瀚 (001)
Discussion on Shang Bronzes from Chenggu and	
Yangxian Counties, Hanzhong	Zhu Fenghan (026)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族屬問題的再討論	李伯謙 (052)
Revisiting an Ethnological Issue of the Shang Bronzes from	
Hanzhong Region	Li Boqian (060)
城固洋縣青銅器所含周文化因素之我見	李朝遠 (073)
The Zhou Cultural Elements on the Bronzes from Chenggu	
and Yang Counties	Li Chaoyuan (092)
歷史時期陝西漢中地區的地理環境與地緣政治結構（上）	李孝聰 (119)
The Geographical Context and Geopolitical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Hanzhong Region, Shaanxi	Li Xiaocong (134)
漢中出土商代銅器的埋藏問題	孫 華 (170)

On the Burial of Shang Bronzes from Hanzhong	Sun Hua	(203)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初步科學分析	梅建軍 陳坤龍 曹 琦	(250)
A Preliminary Scientific Examination of Shang-Dynasty		
Bronzes Recovered in Hanzhong, Shaanxi Province, China	Mei Jianjun Chen Kunlong Cao Wei	(272)
商周時期的圓形盾易	曹 琦	(298)
Round-shaped <i>dun yang</i> of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Cao Wei	(311)
城固縣出土有銘商代青銅器小議	張懋容	(332)
A Study on the Inscribed Bronzes of Shang Dynasty Excavated		
from Chenggu, Shaanxi Province	Zhang Maorong	(336)
Ornament and Territory: the Case of the Bronzes		
from Hanzhong	Jessica Rawson	(341)
飾樣與地域: 漢中青銅器的個案	羅 森	(362)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378)
漢江上游盆地的青銅時代的若干觀察	羅 泰	(517)
A <i>zun</i> from Yang Xian	Bagley	(570)
一件來自洋縣的尊	貝格立	(601)
從青銅器的風格和分佈看漢中青銅器的來源和當地青銅文化的特點	孫 岩	(626)
Style and Distribution of Bronzes from Hanzhong and		
Their Cultural Implications	Sun Yan	(656)
器名索引		
.....		(686)
後 記	曹 琦	(697)
Epilogue	Cao Wei	(703)

漢中城固、洋縣出土商代青銅器綜論

朱鳳瀚

(北京大學歷史系)

陝西漢中的城固、洋縣一帶，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始，即先後有二十餘批數量達六百多件的青銅器出土。城固、洋縣二縣位於陝西南部秦嶺南麓，漢中盆地之中心。渭水河自西北流經城固縣城東，南入漢江。青銅器出土地點集中於這兩個縣所轄範圍內的漢水支流渭水河、文川河及漢江南北兩岸，其分佈面積，東西約四十公里，南北長約十餘公里。由於銅器集中出土於城固、洋縣境內，故研究者或稱之為“城洋銅器群”。從迄今發表的資料來看，這些銅器的時間上限是二里崗上層二期，下限至殷墟文化三期。但迄今為止，這些青銅器均非科學發掘所獲，亦未能確切證明有出於墓葬中的，已知多出於高於地表的臺地上與河邊，銅器周圍形成長方形坑埋藏，罕有陶器共出。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城固、洋縣境內商代青銅器出土的時間、地點及器類詳見以下表一。此表以及本文所論主要依據為曹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巴蜀書社，2006年）和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洋銅器群整理與研究》（國家文物局科技保護項目結題材料，2005年10月）兩部著作。由表中可知，截至2004年，城、洋地區先後出土青銅容器（食、酒、水器）六十餘件，各類兵器一百七十餘件，此外尚有彎形器、面具等數百件。

表一 城固縣、洋縣出土商代青銅器統計表

縣	年	鄉(鎮)	村	食器	酒器	水器	兵器	其他	本文圖號
城 固 縣	1977	龍頭鎮	龍頭村			盤 1			圖三：5
	1980	龍頭鎮	龍頭村		尊 3 卜 1 三足壺 1 觚 4	盤 1	鉞 4 矛 7	彎形器 41	圖一
	1981	龍頭鎮	龍頭村	鬲 1 簋 1	尊 1 疊 1 卣 1 觚 1 爵 1	盤 1	戈 2 (直 內條形援)	彎形器 5	圖二
	2004	龍頭鎮	龍頭村	鼎 2 卯 1 觚 1					圖三：1—4
	1964	五郎鄉	五郎廟村 (東北)		疊 1		鉞 3 戈 2 (曲內條 形援、三 角形援)	殘陶器	圖五：5
	1965	五郎鄉	五郎廟村 (東北)		瓶 1 尊 1				
	1972	五郎鄉	五郎廟村 (東)		尊 1				圖五：4
	1975	五郎鄉	五郎廟村 (北)		瓶 1		戈 1	銅罐 1	圖五：3
	1988	五郎鄉	五郎廟村 (北)				鉞 2		
	1970	五郎鄉	渭水村 (北)	鼎 1					圖五：1
	1973	五郎鄉	渭水村 (北)	鼎 3 卯 2				彎形器 10	圖四：1—5
	1975	五郎鄉	渭水村南 300 米	鬲 1					圖四：6
	1975	五郎鄉	呂村 (北)	簋 1					圖五：2
	1992	五郎鄉	渭水村 (北)					獸面具 1	
	1963	寶山鎮	蘇村塔 冢村		尊 1			牛面具 14	圖一一：8
	1965	寶山鎮	蘇村塔 冢村		尊 1				圖八：4
	1973	寶山鎮	蘇村塔 冢村		尊 1				圖八：3
	1974	寶山鎮	蘇村塔 冢村		尊 2				圖八：2
	1955	寶山鎮	蘇村小冢村 (中部)				矛 21		圖一〇：7

續表

縣	年	鄉(鎮)	村	食器	酒器	水器	兵器	其他	本文圖號
城固縣	1959	寶山鎮	蘇村小 家村 (中部)		斝 1				
	1976	寶山鎮	蘇村小 家村 (西北)		方罍 2		戈 97 (直內三 角形援 83、直 內有胡 長三角 形援戈 14)	泡 284 (尖頂 193、透 頂 91) 牛首形 面 具 11、人 面具 23	圖八：1 圖九：7—10 圖九：11 圖一一：7
	1977	寶山鎮	肖家村		方罍 1 (“亞伐”)		戈 16 (直內條 形援 1、 有胡直 內條形 援 5、 直內三 角形 1)		圖九：3—5 圖八：6 圖九：1
	?	寶山鎮	蘇村			盤 1 (陝西博)			
	?	寶山鎮	蘇村楊 寨 村 (西北) 水河東 岸 (河 下)	鼎 1			戈 1 (直內有 胡長三 角形援 戈)		
	?	寶山鎮	江村				鉞 1		
	1986	原公鎮	西壩村				鉞 1		圖一一：4
	1988	原公鎮	西壩村				鉞 1		
	1992	博望鄉	陳邸村		方罍 1 (“山父 己”)				圖八：7
	1988	文川鎮					鉞 1		圖一一：2
	1999	文川鎮					劍 1		圖一〇：6
洋縣	1976	蓮花鄉	蓮花村		瓶 1				圖五：6
	1984	柳林鎮				盤 1			
	?	城固縣 蓮花辦 事處			罍 1				圖五：7
	1959	馬暢鎮			方斝 1				圖七：6
	1990	馬暢鎮	安巷村 (安冢北)		罍 1 瓶 5				圖七：1—5
	1964	謝村鎮	六陵渡村	鼎 1	尊 1				圖六：1

續表

縣	年	鄉(鎮)	村	食器	酒器	水器	兵器	其他	本文圖號
洋 縣	1988	謝村鎮	六陵渡村 (南)漢江北岸		甌 1				
	1979	謝村鎮	范壩村 (北)				鉞 3 斧 2 戈 8 刀 1 鎛 17 彎形器 3 歧 鋒 器 10 勾形器 1 鈴 1 鳥形飾 4 魚形飾 2 夔形飾 2 等)		圖一〇：1 圖一一：10
	1964	小江鄉	張村 (西北) 漢江南岸	簋 1	尊 1 罍 1 盤 1				圖六：3-6
	1981	小江鄉	張村 (西北) 漢江南岸	鼎 1 (不存)		罍 1 獸面紋 觥 2			圖六：7、8
	1957	黃安鎮	張家堡 (北)漢江南岸	鼎 1					
	2002	洋縣北環路西段		鼎 1			戈 1 (直 內條形 援)		

由於城固、洋縣銅器出土屬於上述情況，其是否出自墓葬以及在墓葬中的組合等情況尚不能確知，這自然為更多地瞭解這些青銅器所代表的文化內涵帶來了困難。1983年，李伯謙先生曾發表文章論述城固青銅器^[1]。現參考李先生文章的見解，對城固出土青銅器的組成、性質與年代作進一步分析。

先討論一下這批青銅器中僅有的一組屬二里崗上層時期的青銅器。此即1980年在城固龍頭鎮龍頭村火疙瘩出土的青銅器，皆酒器，有觚四、尊三、卣一、三足壺一(圖一)。火疙瘩是鎮南30米的一個佔地一畝六分二厘的土包，銅器出自土包東北角，從出土情況看，既非墓葬，亦非窖藏^[2]。從這批器物的形制特徵上看，觚有粗體與較細體及細體之分，但皆尚未有鼓起的中腰(即下腹部)，其中粗體觚(圖一：4)形制接近於白家莊M3出土粗體觚(M3：8)，但曲率較大；細體觚(圖一：7-9)形制也近同於白家莊M3出土的細體觚(M3：5)，曲率也顯得稍大。折肩尊(圖一：

[1] 李伯謙：《城固銅器群與早期蜀文化》，《考古與文物》1983年2期。

[2] 王壽芝：《陝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1988年6期。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洋銅器群整理與研究》，國家文物局科技保護項目結題報告，2005年。曹璋主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巴蜀書社2006年。

1) 的形制與白家莊 M 3 出土尊相比，口外張程度較小，但頸、腹、圈足形制均相近^[1]。所出兩件圓肩尊（圖一：2、3），不見於鄭州地區與其他區域。所出提梁折肩卣（圖一：5），如果除去提梁與蓋，其形制基本上即與鄭州向陽回族食品廠窖藏出土的折肩、深腹的羊首罍近同；而異形的三足壺（圖一：6），其器身作深腹、長頸、圜底，造型也與鄭州向陽回族食品廠窖藏出土的長身、深腹卣器身相近同^[2]。所以，龍頭鎮這批銅器的年代大致相當於二里崗上層二期，亦即白家莊期。由以上所作的形制分析可知，漢中在二里崗上層時期即已與鄭州地區為中心的二里崗文化接觸，但從青銅禮器存在一定的變異程度看，這種接觸也可能是間接的、輾轉的，是承襲了另一與二里崗文化有直接接觸的文化而對二里崗文化有所變異的結果。

下面討論作為城、洋銅器群主體的屬商後期的青銅器。這些器物，按其形制特徵，似可從以下三部分進行討論：

第一部分是與殷墟銅器形制相同的器物。

也正因形制相同，可以比照殷墟青銅器分期方法（按：分期方法本自拙著《古代中國青銅器》第十章有關論述。各期的年代範圍大致是：一期：盤庚至小乙；二期 I：武丁早期；二期 II：武丁晚期至祖甲；三期 I：廪辛至文丁；三期 II：帝乙、帝辛），將其所屬年代大致區分如下：

殷墟青銅器一期：

屬於此期的銅器有 1973 年五郎廟村出土瓿（75：136，見《考古》1980 年 3 期圖版伍：2）；1981 年、2004 年城固縣龍頭鎮龍頭村火疙瘩先後出土的兩批青銅器；1973 年城固縣五郎鄉的五郎廟村、湑水村相繼出土的五件鼎、鬲以及 1975 年在五郎鄉湑水村出土的一件鬲。

1981 年龍頭村出土青銅容器計鬲、簋、爵、觚、卣、尊、罍、盤各一（圖二）。其中爵（圖二：3）的形制作微垂腹，三短細足外撇，與小屯 M 333：2031 爵同。一尊一罍相組合，尊（圖二：6）紋飾細密，罍（圖二：7）紋飾作粗獷的高浮雕狀，均

[1]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 10 期。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新發現的商代窖藏青銅器》，《文物》1983 年 3 期。

與小屯 M 333 尊、罍相配之方式及形制、紋飾特徵相同^[1]。雙耳簋（圖二：2）耳接於口沿與上腹部間，與盤龍城李 M 1 出土的屬二里崗上層二期的簋近同^[2]，但所飾斜行的勾連雷紋則是在殷代早期纔出現的。所出細長頸圓鼓腹的提梁卣（圖二：5）與 1977 年發現的平谷劉家河商墓所出卣形制近同^[3]。小屯 M 333 與平谷劉家河商墓均屬殷墟文化一期。

2004 年龍頭村出土的鼎二、鬲一、甗一（圖三）中，甗（圖三：4）的形制較特異，下腹圓鼓，三足下部有四菱形足套，在商器中尚未見到。但所出尖圓錐狀足鼎（圖三：1）形制與安陽三家莊 M 3：2 鼎^[4]及小屯 M 333：R 2054 鼎相近同^[5]。另一柱足鼎（圖三：2）作深腹，微顯垂腹，足內部作弧線使三足略顯內勾，這一特點與安陽洹北三家莊東南窖藏出土的鼎相同^[6]。鬲（圖三：3）雖作深腹，有二里崗上層期的特點，但三錐狀足粗而外撇，足跟圓鈍，已非二里崗上層期特徵，而同於殷墟青銅器一期鼎的錐狀足。所以，2004 年龍頭村所出器物年代亦大致相當於殷墟青銅器一期。

1973 年城固五郎鄉湑水村出土的五件鼎、鬲（圖四）中^[7]，上腹部飾雲紋紋飾帶的鼎（圖四：3）淺腹，三長圓錐形足外撇，足跟已較鈍。此型鼎已見於屬二里崗上層二期 II 階段的鄭州北二七路 M 1 出土的鼎即北二七路 M 1：3^[8]，但北二七路 M 1：3 鼎腹較深，腹壁直。屬於殷墟青銅器一期的安陽洹北三家莊東南窖藏中也出土此型鼎，惟腹略深^[9]。五郎廟村出土此件鼎的年代應亦大致相當於殷墟青銅器一期。其他幾件鼎中，圓柱足鼎（圖四：1）的形制特徵同於上舉 2004 年龍頭村出土之鼎。淺腹粗圓錐狀足、上腹飾雙弦紋的鼎（圖四：2）是流行於殷墟青銅器一期的形制。兩件作束頸、高圓錐狀足跟、腹飾折角形弦紋的鬲（圖四：4、5）足跟部的形制

[1] 《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殷墟墓葬之五——丙區墓葬上》，歷史語言研究所，1980 年。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 年—1964 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

[3]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發現商代墓葬》，《文物》1977 年 11 期。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三家莊東的發掘》，《考古》1983 年 2 期。

[5] 《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殷墟墓葬之五——丙區墓葬上》，歷史語言研究所，1980 年。

[6] 孟憲武：《安陽三家莊出土的商代窖藏青銅器》，《考古》1985 年 12 期。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郭家莊東南 26 號墓》，《考古》1998 年 10 期。

[7] 按此五件鼎、鬲出土年代，上文所舉曹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與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洋銅器群整理與研究》記述不一，前者注明是 1973 年，後者為 1975 年，此暫從前者。

[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北二七路新發現三座商墓》，《文物》1983 年 3 期。

[9] 孟憲武：《安陽三家莊、董王度村發現的商代青銅器及若干問題的討論》，收入《安陽殷墟考古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

特徵同於殷墟青銅器一期鼎（即粗而鈍尖），其年代亦可暫估計為殷墟青銅器一期。

1975年五郎鄉渭水村出土的深腹直壁高粗圓錐狀足鬲（圖四：6）之形制近於上舉2004年龍頭鎮龍頭村出土的鬲，而腹相對較淺，亦當與以上五器歸於同期。

殷墟二期第Ⅰ階段：

相當於此一階段的青銅器有1970年城固五郎鄉渭水村北出土的鼎、1964年洋縣謝村鎮六陵渡村出土的同形鼎與折肩大口尊、1975年城固五郎鄉出土的瓿、1990年洋縣馬暢鎮安巷村出土的五件瓿。

1970年城固五郎鄉渭水村北出土的鼎（圖五：1）與1964年洋縣謝村鎮六陵渡村出土的鼎（圖六：1），形制均同於安陽59武官村M1出土的兩件鼎（59武官M1：2、3）^[1]，其特徵是較深腹，三柱足較細，略顯內勾，足上部即根部稍粗，保留由圓錐形足演變而來的迹象。59武官M1出土青銅器屬於殷墟青銅器二期第Ⅰ階段。

1964年洋縣謝村鎮六陵渡村出土的大口折肩尊（圖六：2）口部已殘缺，其體形較矮寬，腹部鼓脹，圈足較矮，形制近似於小屯M331出土矮體尊（M331：R2070）^[2]，惟圈足下部呈坡狀，其年代當與上舉同出的鼎相近同，即相當於殷墟青銅器二期第Ⅱ階段。此外，1964年洋縣小江鄉張村出土的折肩大口尊（圖六：3）作矮坡狀圈足，1974年城固縣寶山鎮蘇村出土的大口折肩尊作深腹，下腹微折，亦作矮坡狀圈足（圖六：2），似均當歸入此階段。

1975年城固五郎鄉出土的瓿（圖五：3）與1990年洋縣馬暢鎮安巷村出土的五件瓿（圖七：1—5），腹均較深，圈足較高，其年代均可定在殷墟青銅器二期第Ⅰ階段。1976年城固蓮花鄉蓮花村出土的瓿（圖五：6）亦作深腹，圈足較高，但下腹部內折。類似形制的瓿見於藁城臺西商墓M112出土的瓿^[3]，惟該瓿的頸與圈足均較高。故將其年代定在殷墟青銅器二期第Ⅰ階段。

殷墟青銅器二期第Ⅱ階段：

大致可以歸屬於此一階段的銅器有1972年城固五郎鄉五郎廟村東北出土的大口折肩尊（圖五：4），1964年洋縣小江鄉張村出土的無圈足的圓罍（圖六：4），1959年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考古》1979年3期。

[2] 《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殷墟墓葬之五一丙區墓葬上》，歷史語言研究所，1980年。

[3]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藁城臺西商代遺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洋縣馬暢鎮出土、現藏於陝西省歷史博物館的方柱“龍鳳紋壘”，1965、1973年在城固寶山蘇村相繼出土的大口折肩尊（圖八：4、3），1976年蘇村西北出土的兩件同形的方壘（圖八：1），1977年城固縣寶山鎮肖家村出土的“亞伐”方壘（圖八：6）。這些器物之形制特徵如大口折肩尊腹較淺，高圈足，高度近腹深，同於小屯M 18：12；方壘均無圈足，平底內凹（似乎是酒瓶的模樣，底部向內向上內凹），此平底內凹的特徵見於小屯M 18：37圓壘^[1]與安陽郭家莊東南M 26：11^[2]，所以均當歸屬於殷墟青銅器二期第Ⅱ階段。1959年馬暢鎮出土的壘之形制可早到殷墟青銅器二期第Ⅰ階段，但其足部亦有紋飾，這一特徵在殷墟青銅器中似在二期第Ⅰ階段纔出現，如婦好墓所出方壘^[3]、花園莊M 54所出壘^[4]。所以這裏將此方柱壘歸入二期第Ⅱ階段。此壘值得注意的是上腹部的垂冠顧首大鳥紋與口沿部分蕉葉紋中的前卷尾鳥紋，其紋樣特點已與西周紋飾極近，此垂冠顧首大鳥紋似是最早的一例。

殷墟青銅器三期第Ⅰ階段：

從形制來看，相當於此階段的青銅器有1975年城固五郎鄉呂村出土的斜腹壁高圈足簋（1964年洋縣小江鄉張村所出簋殘圈足，但腹部形制與紋飾相同，可能屬同形簋），1964年洋縣小江鄉張村出土的鬲形壘，1981年洋縣小江鄉張村與城固縣博望鄉陳邸村出土的矮圈足圓壘。

腹壁斜內收的盆形簋在殷墟青銅器中約始見於三期第Ⅰ階段，如安陽大司空村58M 51出土簋^[5]，但像1975年五郎鄉呂村出土的腹部作此種形制的簋（圖五：2）有較高的圈足，直壁圈足而有高階狀足跟，在殷墟斜腹壁的盆形簋中較少見。洋縣小江鄉張村出土的鬲形壘（圖六：5）在殷墟青銅器中也是在三期第Ⅰ階段纔開始流行，此前在二期第Ⅱ階段流行的是淺腹的罐形腹壘。此件壘的形制特徵與安陽劉家莊北M 1046：20壘、殷墟西區M 875：5壘^[6]及郭家莊M 160：174壘（惟無柱）相同^[7]。此三墓所出青銅器皆屬三期第Ⅰ階段。1964年洋縣小江鄉張村及1992年博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小屯村北的兩座殷代墓》，《考古學報》1981年4期。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郭家莊東南26號墓》，《考古》1998年10期。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花園莊54號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1期。

[5]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1958年春河南安陽大司空村殷代墓葬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10期。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1期。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望鄉陳邸村出土的矮圈足圓罍（圖八：7），深腹，腹壁斜內收，頸較高，矮圈足作坡狀，肩部飾渦紋，此種形制與紋飾特徵見於屬殷墟青銅器三期第Ⅰ階段安陽戚家莊M 269出土的同形罍（M 269：35）^[1]。陳邸村出土的罍頸內側還有“山父己”銘文，“山”是在商後期金文中多見的商人氏名。

僅就以上對城洋銅器中的容器形制的分析，可以知道城洋商後期銅容器大致的時段範圍是在殷墟青銅器一期至三期第Ⅰ階段內。

綜上所析，城固、洋縣青銅容器絕大多數從形制（造型的時代特徵及其演變規律）與紋飾（主要紋樣的時代特徵及其演變規律）兩個方面的觀察，基本上可以歸入殷墟青銅器系統中。與殷墟青銅器有較大差異的富地域特點的容器甚少，唯一在形制上有點特點的是1964年城固五郎鄉五郎廟村出土的罍（圖五：5），從其淺腹折肩的特點看，不會晚於殷墟青銅器二期第Ⅰ階段，但其折腹高圈足的形制在殷墟青銅罍中似未見到，而且其腹中部主紋飾用斜行的單純勾連雷紋亦非此一時段殷墟青銅器中所行用的。

第二部分是與殷墟青銅器有聯繫的器物。

這部分銅器皆屬兵器。城固、洋縣出土的兵器衆多，其面貌亦大致可分為與殷墟有聯繫的與非殷墟類的兩類。所以稱“與殷墟有聯繫的”而未言“與殷墟青銅器相同”（即有源於殷墟的考慮），是因為不同形制特徵的青銅兵器的源流是一個尚需要加強研究的問題。如三角形援戈在殷墟各期均有發現，但其形制起源與流通的問題，學者們有不同見解。與殷墟有聯繫的青銅兵器主要是戈、矛。戈在殷墟出於期別可考的墓葬，其流行時間大致可知，可以作為城洋同類器流行時間的參考。鑑於此，其他見於殷墟的兵器器形也可以藉殷墟器物來作為推測其流行年代之參考。

戈包括以下三型：

直內條形援無胡戈，1981年城固龍頭鎮龍頭村出土二件（圖二：9、10）、1977年城固寶山鎮肖家村出土十件（圖九：1、2），援長與援本的比例在3.1以上，屬於殷墟直內戈中的直內窄長條形援戈，均有上下闡。此型戈在殷墟中使用時間較長，從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殷墟戚家莊269號墓》，《考古學報》1991年3期。